

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

何大进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

何大进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

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何大进著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8

ISBN 7-210-02012-8

I. 晚……

II. 何……

III. 晚清,中美关系——历史

IV. K25

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

何大进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068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 320千字 印数:1-1500册

ISBN 7-210-02012-8/K·219 定价:26.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导 言

1784年2月,美国一艘木制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启航,越大西洋,绕好望角,经印度洋,劈波斩浪,行程万里,终于在1784年8月抵达广州,从而叩开了中美两国直接贸易的大门,开创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纪元。

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远离西方先进文明,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下的愚昧、落后的封建国家;而当时的美国,也还只是一个独立伊始,人口只有300多万,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下的邦联制国家。历史越过两百多年后,中美两国都发生了巨变。中国经过一段饱经磨难,备受屈辱和浴血奋战的历史,终于获得了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至本世纪末,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稳

定,市场繁荣,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与此同时,美国也迅速崛起,仅仅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它便从一个濒临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小国,迅速发展成为地跨北美大陆,经济实力遥居世界榜首的资本主义大国;再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它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科技和竞争实力上,都居于全面的领先地位,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综观这两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美国的迅速崛起和20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腾飞,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观的篇章。因此,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便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之众,发表成果之多,皆为其他同类学科所远不及。

然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又是当前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难点”。

晚清中美两国发生交往的过程,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逐渐解体、蜕变和转型的过程,也是中国逐渐从闭关自守走向门户开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侵略与反侵略,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始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时代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对象的多重性。一方面,由于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或认识水平的差异,人们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往往会因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得出不同的结论;另一方面,这段复杂并且充满矛盾的中美关系史,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供人驱遣、相互分歧的记载,如果我们不抓住历史的本质和主流,任何人几乎都可以轻易地从这些记载中,为截然相反的观点采撷自己所需要的佐证。因此,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便出现了不少分歧和难点,长期以来,这些分歧和难点在不断地“折磨”着中外史学家们。

也许是不怕“折磨”,也许是出于某种“嗜好”,我终于还是涉足了这段历史,并且“执迷不悟”十几年,于是便有了一些文章和著作。本书阐述的观点,有的在过去本人所发表的文章中已有论及,

有的则是近年来尚未发表的看书心得。同意或是反对书中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学术上的探索,交流乃至于辩驳,能使我们加深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利于我们珍视现在,着眼未来。

二

研究中美关系之难,还在于美国本身便是一门难懂的学问,是一个“谜”。

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却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的政教分离。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订下列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① 美国政府后来把这一条款演绎为“政教分离”,并且列举了“政教分离”的十点理由。^② 尽管美国人都接受了这一解释,但由于美国人的宗教感情和该项宪法条款的模糊性,美国的宗教与政治历来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关系。美国的国家箴言是“我们信任上帝”;国会两院开会时是以牧师的祷告开始的;而在近代美国驻华使节中,有不少人本身便是传教士。美国教会不仅直接推荐教士参加政治竞选活动,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鼓动社会舆论,影响政府内外政策。由于美国宪法给教会参政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因而美国教会并不是单纯的宗教文化团体,其政治触角已经深入到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晚清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人在外交政策上奉行“孤立主义”,但在价值观念和和行为

^①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页。

^② 康拉德·H·莫尔曼:《政教分离之墙》,波士顿,1951年版,第81-82页。引自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

方式上却又奉行“扩张主义”。华盛顿在他的《告别辞》中告诫国人说：“欧洲有一套与我们无关、或者关系非常微小的根本利益。因此，它必然经常陷于其起因基本上与我们不相干的纷争之中。所以，我们如果通过人为的纽带，把我们牵连进它通常的那些政局变幻中去，或者卷进与它为友或为敌的那些通常的结合和冲突中去，那必定是不明智的。”^① 华盛顿的告诫被认为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最早表述，即不要干涉外界的事务。然而，美国人却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奉上帝的召唤来到尘世的，“世界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有按其清教理想改变世界的义务”。^② 因此，把自由与文明推向荒野，推向世界便成了美国人的“天定命运和崇高职责”。^③ 本着这一信念，美国人不仅披荆斩棘，向西开拓；而且高举十字架，踏上了远征东方之程。

美国人自认为是“道义”之邦，并在对外交往中以“道义”原则相标榜，而且有时也接受“道义”的制约。但是，美国人又是一个很现实的民族，他们决不会为了“道义”而牺牲国家利益，也决不会为了遥远的理想而牺牲眼前利益。在晚清中美关系中，无论是商人，传教士，还是美国政府，无论是追求眼前利益，还是实现长远目标，他们采取的都是很现实的态度。当“道义”和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往往是放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三者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异。

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和对外交往中，此类“悖论”，不胜枚举。因此，在言辞与行动，理想与现实之间，美国往往会表现出令人瞠目

① 塞·埃·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6—407页。

② M. 韦伯：《经济与社会》(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纽约，1968年版，第542页。

③ D. 奇德斯特：《力量模式：美国文化中的宗教与政治》(David Chidester, Patterns of Power: Religion and Politics American Culture)，新泽西，1988年版，第100页。

结舌的反差。而这一切,又不是可以简单地用“狡猾”或“虚伪”所能诠释的。因此,要研究晚清中美关系,首先必须读懂美国。

三

研究晚清中美关系,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的巨变,不能不研究近代美国赴华传教士的活动。

对于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美国资深的传教士史学家赖德烈(K.S. Latourette)曾经作过如下概括:

传教士所做的……就是帮着改造其本国的舆论。……在美国大量发行由(新教)教会教育运动会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必须补充一下,那是一些对中国抱同情的书籍。那些在我们大学里讲授中国课程的大部分人——可能是极大多数——都同中国的传教活动有关联。他们或过去曾作过传教士,或是传教士的后代。传教士们可以对国务院和国会议员一再重复地说出他们关于中国事务的信念。^①

中国学者亦认为:“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角。”^②显然,在晚清中美关系中,美国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这点,史学界并没有分歧。问题在于,如何评价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

① V. 米塔洛:《美国传教士、孙逸仙和中国革命》(Michael V. Metallo, *American Missionaries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载《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67辑,1978年3月,第261-282页。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传教士远涉重洋,赴华传教,目的是使中国全面向“基督”开放,因而始终具有传播福音以使“异教徒”皈依上帝的强烈使命感。但是,晚清美国赴华传教士的活动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是与血腥的暴力征服和中华民族的屈辱紧密相联的,因此,无论美国传教士来华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们的传教活动和其他文化活动,都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传教士来华之初,中国正实行严厉的禁教和闭关政策,直接在中国宣传教义和招收教徒的工作难以开展,因此,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来传播福音,成为晚清美国赴华传教士活动的主要内容。从文化活动来看,收效最大,影响最深的,又莫过于举办教育,而且这种方式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于是,传教士便将文化活动的重点放在教育方面。

传教士举办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具有西方观念,并能取代中国封建士大夫的“社会俊杰”,以控制或影响中国社会未来的变化,使中国全面向“基督”开放。显然,其初衷是希望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而不是培养其异化力量。然而,19世纪的新教文化,从广义上来说,代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教会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也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自由、民主、平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意识。因此,晚清美国赴华传教士所从事的文化教育活动,不仅传播了西学,推动了晚清教育体制的改革,而且培养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新型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中的许多成员,成为近代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鼓动者。

作者 1998年6月于广州

CONTENTS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章 早期中美关系与美国对华传教的缘起	(1)
-----------------------------	-----

第一节 早期中美贸易与传教士来华	(2)
第二节 美国赴华传教士的早期文化活动	(9)
第三节 美国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	(18)

●第二章 传教士与《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	(30)
----------------------------	------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的鸦片战争观	(31)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	(39)
第三节 美国传教士与《中美望厦条约》	(48)

●第三章 五口通商时期美国的修约活动	(59)
--------------------------	------

第一节 修约问题的提出与麦莲的修约活动 ..	(60)
第二节 伯驾的修约活动与侵台主张	(67)

第三节	传教权利与《天津条约》的签订	(76)
-----	----------------	------

●第四章	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85)
------	---------------	------

第一节	洪秀全与基督教	(85)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交往	(99)
第三节	罗孝全的天京之行	(106)
第四节	美国朝野的反应与马沙利的对华政策	(113)
第五节	麦莲对“中立”政策的调整	(122)

●第五章	中西学交汇与晚清开眼看世界思潮	(129)
------	-----------------	-------

第一节	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	(130)
第二节	裨治文与魏源的《海国图志》	(144)
第三节	雅裨理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157)

●第六章	“师夷”“制夷”与洋务思潮	(170)
------	---------------	-------

第一节	《教会新报》与洋务思潮	(171)
第二节	“格致学”与洋务运动	(183)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留美幼童的派遣	(201)

●第七章	西学东渐与晚清教育变革	(220)
------	-------------	-------

第一节	美国教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221)
第二节	狄考文与登州文会馆	(232)
第三节	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241)

第四节	近代中国教会女学的兴起与发展	(257)
●第八章	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	(268)
第一节	“门户开放”政策的源起与实质	(269)
第二节	从教案到义和团运动	(283)
●第九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	(302)
第一节	辛亥革命的爆发与美国朝野的反应	(302)
第二节	西方列强、传教士与袁世凯的上台 ...	(316)
第三节	传教士与“外交承认”问题	(327)
●【附录一】	主要中、英文参考资料	(336)
●【附录二】	英汉译名对照表	(353)

●第一章●

早期中美关系与美国 对华传教的缘起

在 19 世纪初叶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前,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三次基督教入华现象。第一次在公元 7 世纪唐太宗贞观年间,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里派由波斯传入中国,时称“大秦教”或“景教”,在中国流传约 200 余年,至唐武宗崇道废佛时,亦遭挫难,未几中绝。第二次在公元 13 世纪中叶,随着元朝的兴起,景教再次入华,同期入华的还有罗马教廷派遣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这两派在中国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不到 100 年,随着元朝的倾覆,基督教再次消失。16 世纪中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推动,基督教势力第三次入华。康熙初年,中国天主教各派因尊孔祭祖问题发生“礼仪之争”,绵延数十载而未决。长期对天主教持宽容

态度的康熙帝,为维护国家主权,明令禁教。在以后百余年间,清廷皆奉此不变。但这次基督教势力在中国并未完全禁绝,有些西方传教士仍然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潜入中国,从事秘密的传教活动。

19世纪初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海外殖民活动的加强,出现了新教传教士赴华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为前三次所不及。这次运动肇端于英国,美国传教士则后来者居上,在这次传教运动中扮演了主角,并对近代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早期中美贸易与传教士来华

美国对华传教运动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除了传播福音的“使命感”外,美国传教士赴华,还缘于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是迅速发展的早期中美贸易,它不仅促进了美国对华传教运动的发生,而且为美国赴华传教士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其二是英国对华传教运动的影响和美国海外传教会的兴起,为美国对华传教运动提供了组织和人员上的准备。

一、早期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

早在殖民地时期,北美人民便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发生了商业交往。东印度公司将中国的茶叶从广州经大不列颠运往北美,又将北美的毛皮、人参运往中国。^①因此,北美人民对遥远的中国市场并不陌生。独立战争后,美国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由于置身于英国的殖民体系之外,美国商人失去了他们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曾经享有的权益和市场。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不久,

^① 潘序伦:《美中贸易》(Shu-Lun Pan, 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纽约,1924年,第5-9页。

英国便通过了新的航海条例,对美国的海外贸易进行了种种限制。根据新的条例,美国被排除在昔日的主要海外市场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贸易之外,美国的航运业、渔业和奴隶贸易因此而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英国的排挤和限制,美国独立之初,在对外贸易方面,平均每年要损失 50 万美元,1786 年,马萨诸塞出口只有 1774 年的四分之一。^①

然而,美国独立却为中美直接贸易提供了前提。独立后,美国商人虽然失去了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市场,但遥远的东方市场却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对已经独立的美国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了。于是,美国商人便将其目光投向了广阔而诱人的中国市场。

1783 年,波士顿、纽约、费城、萨冷等地的商人,开始酝酿赴中国贸易的问题。1783 年 12 月,波士顿商人集资装备了一艘名叫“哈里特号”(Harriet)的商船,满载人参前往中国,想率先叩开神秘的中国市场。当该船行至好望角时与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遇。由于英国商人害怕美国人打入中国市场与其竞争,便设法加以劝阻,并愿意以两磅新茶与一磅人参交换的“优惠”条件与之交易。英国人的劝阻使“哈里特号”船长对神秘的中国市场产生了动摇,由于不愿冒险和贪图眼前小利,他在与英国人达成交易后,便满载新茶欢天喜地地返回了美国,从而失去了一次本来应该属于他的历史性荣誉。

在“哈里特号”启程两个多月后,另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也启程前往中国。“中国皇后号”载重 360 吨,它是由费城富商罗伯特·摩里斯和纽约一些商人共同投资的。摩里斯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字人,1781 年邦联政府成立时任第一届财政部长。1783 年 11 月,他曾写信给当时的邦联政府外长约

^① 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2 页注。

翰·杰伊说：“我正要派遣几只船到中国去，以便鼓励其他人从事商业上的冒险。”^①“中国皇后号”的船长是约翰·格林，出身于海军军官，富于航海经验。货物管理员是波士顿的陆军少校山茂召，他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功勋卓著，精明强干。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满载40多吨人参、毛皮、棉花、胡椒和铅等物品从纽约放洋，绕好望角，经印度洋，历时6个多月，航程13000英里，于1784年8月28日到达广州。格林船长下令向停泊在广州的各国商船鸣礼炮13响，欧洲各国的商船也鸣炮还礼和表示祝贺。

“中国皇后号”带有一份美国政府颁发的“航海护照”，上面对所经国家和地区首脑人物的称呼无所不包，计有：“最高、最具权威的、高贵、显赫、庄严、可尊、可敬、聪明、慎重的君主、皇帝、国王、共和国元首、亲王、公、伯、男、爵主、市长、议员、以及一切负有令名的城市和地方的法官、军官、判事和监督等，不论僧俗，凡是看到或聆读到这些特许状的人等。”^②

护照请求沿途对这艘船只予以关照。中国人在分辨出他们是不同于英国人的美国人后，称他们为“新国民”，对他们表示友好。在中国行商的帮助下，美国人卖掉了货物，然后采购了回程货物，计有红茶2460担、^③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磁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④“中国皇后号”在中国逗留了3个多月，于1784年12月8日从黄埔港启程返航，经好望角，于1785年5月10日回到纽约。这次贸易前后历时15个月，商船载重量仅360吨，

①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

②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6页。

③ 1担等于1百市斤、133 $\frac{1}{3}$ 磅。

④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牛津，1926年版，第2卷，第85页。

但所获纯利竟达 30727 美元,约为投资额的 25%。^①“中国皇后号”首航的成功,成为当时北美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纽约的报纸纷纷对航行情况作了长篇报道,有一家报纸甚至要纽约全城的教堂敲起钟来,“一起向上帝感恩”。^②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沉浸在对华贸易的梦幻之中,从新英格兰的城镇到纽约、费城,一切谈话都是以中国贸易为主题,以至“每一个沿着海湾的小村落,只要有一只能容 5 个美国人的单桅帆船,都在计划到广州去”。^③

“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主要意义在于开辟了中美国两国人民的直接贸易往来,为刚刚摆脱殖民枷锁的美国提供了急需的海外市场,并为美国向远东的扩张迈出了奠基性的一步。因此,这次首航被认为是“美国贸易史上的第个一重要里程碑”,^④它不但激发了美国商人对华贸易的极大热情,同时也引起了美国邦联政府的关注。山召茂回国后即向约翰·杰伊呈交了首航成功的报告,不久他就接到了以国会名义的复函,认为他的报告有力地说明了“中国贸易可能开辟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并称赞他“此次对华通商的成就,使政府感到莫大欣慰”。^⑤

1785 年,即“中国皇后号”返航的当年,就有 5 艘船只驶往广州。其中“实验号”和“希望号”从纽约启航;“广州号”从费城启航;“土耳其皇帝号”从撒冷启航;“中国皇后号”也立即开始了第二次

① J. A. 史蒂文斯:《1776 - 1796 年一世纪来纽约的进步》(J. A. Stevens, Progress of New York in a Century 1776 - 1876), 纽约, 1876 年版, 第 45 页。

② D. S. 霍华德:《纽约与中国贸易》(D. S. Howard, New York and the China Trade), 纽约, 1984 年版, 第 18 页。

③ A. D. 休斯:《两洋通广州, 早期中国贸易史话》(A. D. Hewes Two Oceans to Canton, The Story of the Old China Trade), 纽约, 1944 年版, 第 27 页。

④ J. 戴维斯:《美国外交公文: 美国与中国》(J. Davids,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第 1 辑, 第 1 卷, 威尔巴顿 1973 年版, 第 14 页。

⑤ J. 昆西:《美国驻广州领事山茂召少校日记》附录(J. Quincy, The Journal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 波士顿, 1847 年版, 第 337 页。